

## 結論

馬海晏加入清末的陝甘回民事變，從「亂民」一躍成為「朝廷命官」，藉由對清廷中央的效忠，馬麒得以繼承馬海晏的職位，開始經營青海地區。辛亥革命爆發後，馬麒審度時勢，轉向支持新中央—北洋政府，不但維持在青海的經營，更進一步擴張自身的勢力。短短兩代的時間，馬麒集青海的軍、政大權於一身，成為一股影響日後西北政局的地方勢力。然而，國民軍的西進，對青馬造成莫大壓力。雙方實力過於懸殊，馬麒決定保存實力，不與硬拼，和平地交出軍、政權。青馬在青海經營多年，國民軍亦不敢小覷青馬這股地方勢力，對其多所拉攏，亦不敢貿然解除地方武裝力量。待中原大戰爆發，國民軍東調，青馬重新掌握軍、政大權，馬麒再度面臨抉擇，決定支持中央—蔣介石，歸順南京國民政府，中央任命其為青海省政府主席，至中共攻陷青海為止，省主席一職皆由青馬擔任。馬麒可謂青馬勢力的奠基者，一手創立私人武裝力量寧海軍，並興辦教育與安定青海境內各民族，使得青馬勢力得以穩固。

1930年的中原大戰後，國民政府不想直接插手西北事務，希望藉由寧夏馬家在西北的力量，穩定西北局勢。但1931年8月，甘肅政變發生，證明寧馬並沒有足夠穩定西北的實力。對中共的作戰、廣州西南國民政府的成立與九一八事變的爆發，使得南京中央分身乏術，無法全力處理甘肅政局，拖延三個多月之久。各地方實力派乘勢而起，影響甘肅政變的發展。馮玉祥在幕後指使雷中田發動政變，試圖在甘肅建立根據地；楊虎城欲以軍事行動解決政變，將陝軍勢力伸入甘肅；寧馬欲和平解決政變，青馬擔任中間調人；吳佩孚也由川入甘，希冀藉由調停甘肅政變，獲得政治資源，東山再起。蔣介石運用楊虎城的力量平息政變，隨即派邵力子任甘肅省政府主席，防制楊虎城的用意相當明顯。從政變前，任地方實力派馬鴻賓為甘肅省主席，到政變後，改任邵力子為省主席，如此轉變，顯示中央對西北地方實力派的不信任，青馬當然也包括在內。馮玉祥電請廣州西南國民政府任馬步芳為師長，以及馬麟領銜通電支持吳佩孚復出這兩件事，都加深中央對青馬的疑慮。在西藏戰爭

前，中央與青海的關係是處在不信任的狀態中。

從甘肅政變發生以後，中央並不信任西北各地方實力派，尤其是青馬。1932年青藏戰爭爆發之際，中央正忙於處理日本與中共問題，對於西南地區的戰事無力兼顧，只得委由地方實力派去處理。當時馬步芳所部的番號為新編第九師，在名義上隸屬於中央軍。馬步芳以「鞏固邊防」向蔣介石要求接濟槍械、彈藥與通訊器材等，青馬聯合中央的支援對西藏作戰，不但鞏固自身勢力範圍，還可藉機補充軍械、軍費，擴充實力；中央在無暇他顧的情況下，給予青馬軍械、軍費的支援，不但免去中央嫡系部隊的調派，還可解決懸之已久的青、康、藏邊界糾紛。不過，在青藏戰爭中，中央顯露出對青馬控制力的薄弱。戰爭期間，蔣介石迫於英國的外交壓力，於1932年10月13日命川、青當局停止進攻，駐守原地；但川、青兩軍不聽中央號令，竟相約進攻昌都。蔣得知消息，於1932年10月24日焦急地再度電令馬麟、馬步芳停止進攻，靜候中央處置。青馬對於中央所下的指示，並非百分之百奉行，甚至去電中央謂：「新九師得中央接濟，益當勉勵工作，整飭軍紀，無論中央令開往何處，無不惟命也」，<sup>1</sup>以「聽命中央」當作交易籌碼，換取中央接濟。待戰事告一段落，青海與西藏當局簽訂《青藏和約》，和約內容事先並未告知中央，簽訂後才呈報，中央只有被動地承認和約的有效性。青藏戰爭促使青馬與中央聯合，但對雙方造成的結果卻大不相同。青馬獲得中央軍械、軍費的支援，在戰後充實軍備，擴充兵源，拓展勢力範圍，並提升在國人心中的形象，向中央展現作戰能力。中央面對國內嚴峻的局勢，無暇顧及西南地區的糾紛，藉由支援地方軍隊解決紛爭，但中央並未隨著戰爭將控制力伸入青海、西康與西藏。由於中央薄弱的控制力，青馬在青藏戰爭後，仍享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，處於半獨立的狀態。

1931年，新疆維吾爾族反抗省主席金樹仁，本是政治事件，竟演變成回、漢衝突。1933年，馬仲英與盛世才相爭之時，曾有建議中央命青海軍隊入新疆平定，並以同屬伊斯蘭教之關係，協助中央大員宣慰當地穆斯林。然蔣以血緣、民族、宗教等關係，未予採納，在孫殿英事件前，蔣對於青馬仍有所顧慮。而盛、馬之爭所引發的回、漢糾紛，在孫

---

<sup>1</sup>「甘肅省主席邵力子轉呈馬麟、馬步芳呈蔣中正電」，1932年10月28日，國史館藏，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，〈特交檔/一般資料〉，檔號：080200-061。

殿英事件中發酵。1933年6月，發表孫殿英屯墾督辦名義，中央所疑慮的，係「回馬各部」的反對，<sup>2</sup>各方所擔憂的，亦恐引起回、漢衝突，促成「回教國」的出現，步上西藏、新疆、蒙古之後塵。青海、寧夏境內有為數眾多的回教徒，馬鴻逵以保衛回教號召民眾，激起同仇敵愾之心。1934年拒孫戰役期間，青、寧聯軍發揮戰鬥力，屢屢抵擋孫軍的攻勢，展現回教部隊的實力。但朱紹良、邵力子等人，顧慮回軍藉拒孫機會擴充實力，則「回族養大難制，中央力量又遠不能及」。<sup>3</sup>由此可知，西北回、漢問題仍未解決，中央顧慮回軍勢力的擴張，對回族地方實力派亦不能完全掌控。

孫殿英避免自身捲入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漩渦，尋求另外發展的機會，主動提出赴西北地區開墾，蔣亦同意此要求，防止其與馮玉祥相聯合。蔣發表孫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，本是權宜之計，當馮玉祥與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事件告一段落，孫抗命西進正好予以中央討伐的口實，乘勢與地方實力派聯手解決孫軍。孫殿英事件固然是個人野心所引起，然而在中央與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對抗和妥協下，孫亦成了犧牲品。閻錫山則大玩兩面手法，在中央、各地方實力派，以及孫殿英之間，取得自身最大利益。

蔣為避免孫殿英與馮玉祥聯合，不顧甘、寧、青三省群情反對，同意孫赴西北開墾的請求，待解決察省事件，再回頭處理孫殿英，此種不惜以鄰為壑的臨時辦法，證明蔣對於孫事並無全盤計畫，造成西北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極大損失。朱紹良在孫殿英事件中，扮演極關鍵的角色。身為中央在西北的代理人，朱深知西北情勢的複雜，雖有胡宗南第一師駐防甘肅，然青、寧諸馬地方勢力穩固，決心以武力反對孫西進；新疆盛、馬之爭未解決；再加上「漢、回素極仇視」，<sup>4</sup>如孫率部西行，西北局勢將益不可為，中央將更難控制西北各地方實力派，能否保住甘肅都成問題。朱的態度，影響了蔣對孫事的轉變，決心解決孫軍。

<sup>2</sup> 周美華編註，《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》（第二十三冊），1933年10月5日條，頁263。

<sup>3</sup> 「南京關蘊中紹密陷二電」，1934年1月31日，國史館藏，《閻錫山檔案》，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/關於解決孫軍之件〉，縮影號：12/0381。

<sup>4</sup> 「甘肅省主席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」，1933年8月25日，國史館藏，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，〈特交檔/一般資料〉，檔號：080200-116。

中央命孫殿英率部駐綏西，孫於 1934 年 1 月擅自率部西行，進攻寧夏，擅委甘、寧、青三省主席，明顯違反中央命令，然中央卻無採取立即措施，拖延至 2 月才撤銷孫本兼各職。從甘肅政變、新疆四一二政變、馬仲英與盛世才之爭，以及孫殿英事件可以看出，中央對於西北問題的處理顯然不夠明快，事情常常愈演愈烈，探其原因，除了內憂與外患交相逼迫之外，西北問題並非蔣心目中的首要目標，因此，蔣會保留中央軍的實力，避免折損。甘肅政變是由陝軍揮兵進入蘭州，政變才告落幕；青藏戰爭發生時，蔣支援青海軍隊與劉文輝部隊武器，以地方實力派的力量，抵抗西藏的入侵；馬仲英與盛世才激戰時，蔣未派一兵一卒進入新疆，僅派黃慕松與羅文幹入新宣慰；在孫殿英事件中，蔣亦是如此，試圖以地方力量解決孫部。

蔣在事前未告知或與青馬商量的情況下，發表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，損及青馬勢力範圍，並因此引發拒孫戰爭。當孫殿英事件告一段落後，蔣遂命戴傳賢、宋子文前往青海宣慰、安撫。然經過青藏戰爭與孫殿英事件後，蔣亦注意到馬步芳勢力的擴張，試圖加以節制，蔣擬調派馬步芳部至河南或寧夏，激起馬步芳的反彈，最終蔣向馬步芳妥協，最主要原因在於蔣需藉助青馬的軍事力量，防堵北竄的共軍。青馬的勢力範圍在孫殿英事件後，並未受到外力的破壞，中央對青海的控制力依然有限。

1935 年，共軍由四川北竄。青馬不欲共軍進入青海，亦不願中央軍藉著剿共之名進駐青海，極力徵調壯丁組織民團，不惜發動海南警備司令部、第一百師、騎五師等軍隊，全力反共，阻止了共軍與中央軍進入青海，並逐漸為蔣所重視。從國民軍西進、青藏戰爭、孫殿英事件至反共戰爭，青馬面對勢力範圍遭受入侵，皆起而反抗，除了國民軍外，成功阻擋西藏、孫殿英、共軍，甚至是中央。1937 年，青馬組一師騎兵出發至陝西、河南、安徽等地對日作戰。至於青馬為何願意出兵抗日？反共戰爭後，青馬獲得中央經濟、軍械的支援，且將新二軍改編為陸軍第八十二軍，陸軍騎兵第五師擴編為陸軍騎兵第五軍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日益密切，且政府遷都重慶，與青海的距離縮短，來自中央的壓力增加。更重要的，青馬出兵抗日，並不會使自身勢力範圍受到損傷。換句話說，如果在損及勢力範圍的前提下，青馬是否會出兵抗日，答案應該

不樂觀。

馬步芳獨攬青海軍權，雖有「國軍」之名，然而青海軍官的任免，由馬步芳決定，軍隊的行動聽命馬步芳調度。對於青海軍隊，中央幾不能過問。馬步芳藉由軍權，逐步奪取政權，為鞏固自身領導，施行嚴密的社會控制，尤其藉由六大中心工作中的編組保甲，嚴格監控青海社會裡的人、事、物，致使中央勢力無法有效滲透政界、軍界，連在青海的黨組織亦無法有效推展工作。馬步芳憑恃軍、政地位，運用監控、排擠的手段對付黨務人員，並包辦大、小選舉，阻礙省黨部、三青團青海支團部，以及軍統局在青海的活動，成功奪得國民黨青海省黨部與三青團青海支團部的黨權。國民黨組織在青海的工作進展不佳，黨權亦為馬步芳所奪，無法發揮牽制地方勢力的作用，而馬步芳集黨、政、軍大權於一身，成為人們口中名符其實的「青海王」。

從 1928 年至抗戰前，青馬與中央互動如何？首先，青海位處西北，境內民族複雜，又與新疆、蒙古、西藏等欲脫離中央之省份相連，為控制境內蒙、藏民族，青馬運用高壓與懷柔的手段。記者范長江認為，中國能指揮青海蒙、藏民族者，在軍事政治方面，恐怕只有馬步芳。<sup>5</sup>青馬控制境內各民族，未如鄰省新疆、蒙古、西藏一般，欲脫離中央，成立回教國，宣布獨立，<sup>6</sup>亦未受到外國勢力的操控。因此，在名義上青海始終屬於中央的一省。

再者，青馬以軍事力量發展勢力，當自身勢力受到外來威脅時，不論對方為何，皆以兵戎相向，但只要不影響青馬的勢力範圍，青馬也不會與中央對抗。馬步芳在青海集黨、政、軍三權於一身，其權力之大，馬鶴天認為全中國僅有山西、廣西比較近似，<sup>7</sup>如將青馬與李宗仁、閻錫山等較大的地方實力派相較，地域性較強，專注於青海勢力範圍的保持與家族利益的鞏固，對中央較無野心。孫殿英事件後，當時甘肅省財政廳長朱鏡宙向蔣報告曰：「馬氏昆仲夙具野心，飢則來附，飽則遠颺，目前之所以戀戀者，羽翼未豐耳」，<sup>8</sup>青馬實力雖不足與中央對抗，亦不

<sup>5</sup> 長江，《中國的西北角》，頁 154。

<sup>6</sup> 長江，《中國的西北角》，頁 158。

<sup>7</sup> 馬鶴天，《甘青藏邊區考察記》，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西北文獻叢書》（二十），頁 221。

<sup>8</sup> 「陳誠摘轉甘肅財政廳長朱鏡宙函」，1935 年 9 月 17 日，國史館藏，《蔣中正總統檔

願中央插手青海事務。對蔣介石而言，青馬的威脅性相對較小，非急欲剷除的目標；再加上蔣介石對內忙於處理其他地方實力派與中共，對外面臨日本的進逼，實在無暇對青海這樣一個邊疆省份實行有效控制，且中央並未藉由青藏戰爭、孫殿英事件，以及剿共，將勢力滲入青海。青馬不獨立、不反叛中央，並在剿共行動中取得相當成果，獲得中央的重視，在青海享有自主權。

抗戰爆發以後，青馬與中央的互動是否產生變化？隨著中央遷都重慶，青馬感受到距離縮短所帶來的壓力。在中央的命令下，青馬組一師騎兵出發至陝西、河南、安徽等地對日作戰，甚至於 1942 年退出駐防十一年的河西地區。然馬步芳憑藉軍、政優勢地位，嚴格控制青海社會，中央勢力並未進一步滲入青海地區。此外，蔣介石對馬步芳亦採取攏絡手段。馬步芳擴張軍權，併吞馬步青的騎五軍時，蔣選擇支持馬步芳；馬步芳與馬麟爭奪政權時，蔣再度選擇支持馬步芳，並委為青海省黨部主委、四十集團軍總司令，承認馬步芳在黨、政、軍三方面的領導地位。蔣之所以會支持馬步芳，係青海軍隊在剿共戰爭中，展現優異的作戰能力，故欲藉助其力量，在抗戰後參與對中共的作戰。因此拉攏馬步芳，換取其對中共作戰的承諾。<sup>9</sup>因此，至 1945 年，中央在青海的控制力仍屬有限，青海在青海王一馬步芳的主政下，依然有高度的自主權，處於「半獨立」的狀態。

抗戰結束後，國共內戰爆發。面對這場全國性的內戰，青馬亦無法置身事外，捲入戰爭的漩渦當中。其堅定的反共立場，並未帶來最後的勝利，隨著中華民國政府遷臺，青馬亦飛離中國大陸，結束其家族在青海四十年的統治。

---

案》，〈特交檔/一般資料〉，檔號：080200-464。

<sup>9</sup>「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羅家倫呈委員長蔣中正函」，1943 年 11 月 26 日，國史館藏，《國民政府檔案》，〈藏政建議（一）〉，縮影號：419/1865。